

本届的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年平均受处分率比普通党员还高得多，只有一个解释，他们的自身素质有严重问题，但是我们的权利结构和选人用人机制体制问题更严重。

现在三十多年的腐败呆账存量太大。矫枉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必须过正。不过正，三十多年的偏差纠正不过来；不过正，不足以争取党心军心民心，也不足以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立场态度和决心。



李永忠

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：“刑上大夫”只是治标

“委员”处分率 远超普通党员

本报记者 刘帅 实习生 王景霞

齐鲁晚报：12月5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《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》，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党的十八大后，中央进行高强度反腐，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？

李永忠：“十八大”到现在两年来的高压反腐，可以称之为建党九十多年来、执政六十多年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力度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、效果最好的一次。强力反腐之前也搞过，但是一般保持在一年左右的时间。十八大以来的强力高压态势至今已两年。

齐鲁晚报：周永康、徐才厚两个特大老虎相继落马，人们说终于“刑上大夫”了，这种举措有什么意义？

李永忠：查处周永康等有多重意义。决心意义，彰显中央坚决反腐决心；震慑意义，震慑问题官员和贪腐官员赶快收敛收手；教育意义，教育公职人员和党员，不能胡作非为；反思意义，就是周永康一开始不是坏人，他是怎么腐败的呢？除了他自身素质不高等主观原因外，还有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方面的问题，这是更重要的客观原因。我们要反思这种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。

还有就是改革意义，就是要改革这种用人体制、权力结构。

齐鲁晚报：这种用人体制、权力结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

李永忠：反腐才两年，落马省部级及以上高层干部就有60多个。其中包括十八届的4名中央委员、6名候补中委和2名中央纪委委员。他们占了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委员会502人的2%（因有4人同时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）。我们党历年来处分党员的比例一般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，很难突破千分之二。本届的中央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年平均受处分率比普通党员还高得多，只有一个解释，他们的自身素质有严重问题，但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机制体制中的问题更严重。

而这两大制度上的硬伤，通常很难通过技术性的改进加以弥补和解决。如果不从体制制度的改革来解决这两大硬伤，最后只能是徒劳无益。

马年冬至的晚上8点，一则看似突然的消息让吃饺子的喧腾声归于沉寂，进而哗声四起，更大的议论引爆全国——令计划落马。两年以来，无论是“周五见”还是“8点见”，冰冷的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”十五个字，让上至副国级下至各地市领导干部的人生突然转变。反腐不断，中纪委网站忙个不停，贪腐官员的心也吊在半空。

近日，记者专访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，他从军队纪委到地方纪委，又从地方纪委到中纪委，几十年的纪检工作经历，使他对我国反腐之路非常熟稔。他认为十八大之后的反腐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，而未来反腐斗争突破口在于权力结构的改革，其中设立政改特区就是“治本”的重要载体。

经改看小岗，政改看后陈

齐鲁晚报：您在公开场合称这是输不起的反腐战争？

李永忠：目前的强力反腐高压态势还不能减弱，因为我们虽然赢得了时间，但是并没有赢得空间。赢得时间是前提和条件，赢得空间才是根本和关键。其中就先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局部空间，然后才能逐步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空间。

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还没设立，但在未来，如果不能设立政改特区，就很难形成政治清明、政府清正、官员清廉的现象，那么就无法把“三清风气”复制到县、市、省乃至全国。所以只有真正通过政改特区，先在局部赢得空间，才能最终赢得全国反腐胜利的整体空间，才能真正打赢这场输不起的反腐败斗争。

齐鲁晚报：政改特区该怎么设立？

李永忠：关于政改，最早的是邓小平1980年的“8·18”讲话，题目就是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》。三十年前，我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，我以为在他的三卷中最重要的就是这篇文章。可惜的是，尽管邓小平强调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，但是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都一门心思抓经济建设，抓经济体制改革，基本不抓政治体制改革。

在今年中纪委三次全会上，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“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”。言下之意，我们党内的权力结构，我们国家的权力结构，还不够科学。如果已经接近科学

了，习总书记只能用改革、改进、改善或者健全和加强党内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机构。这些动词都没用，用的是形成，言下之意是还没有形成。

齐鲁晚报：这貌似很难操作，现实中没有例子？

李永忠：其实习总书记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时，浙江就进行了实践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金丽温高速公路建设涉及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，随着工业园区的开发及城乡一体化建设，全村1200余亩土地被征用，土地征用款达1900余万元。当时由于村里重大决策不公开，村务管理不透明，财务支出不规范，部分村民为发泄对村干部的不满，掀翻了政府公车。村支书不是在换届选举时落选，就是因为经济问题被免职。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村里百姓自发地组织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党支部和村委会的“第三委”——村务监督委员会。这十年，后陈村没有一个村干部违纪违法，没有一笔村集体财产流失，没有一个村民越级上访。

习近平在九年前亲自带队调研，充分肯定了这个村搞异体监督的成功案例，先后五次进行批示。后陈村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也写进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》。在我看来，三十年前经改看小岗，三十年后今天的政改看后陈，如果能够把后陈村的经验推进到县一级、市一级，甚至更上层，我们将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。

在法治前提下，矫枉必须过正

齐鲁晚报：您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反腐必须“矫枉过正”，为何矫枉过正？

李永忠：这些年由于权力含金量急剧膨胀，寻租的机会迅速增加，而相对的监督却不断萎缩。尽管每年都在反腐败，但是基本不在笼子里的权力，其滋生蔓延腐败的速度，远远大于查处的速度。因此不仅出现了大官大贪的必然现象，也出现了小官也能大贪的奇特景象。

我对此的解释就是，假如省委书记的权重是100，对他的监督也是100的话，省委书记的腐败就基本等于0。但如果一个村支部书记的权重只有1，对他的监督却等于0的话，1比0也是一个无限大的数。这就是小官何以大贪的一个数学解读。

现在三十多年的腐败呆账存量太大。矫枉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必须过正。不过正，三十多年的偏差纠正不过来，不过正，不足以争取党心军心民心，也不足以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立场态度和决心。

齐鲁晚报：会不会误伤？

李永忠：真理向前多迈半步就有可能成为谬误。在高压反腐态势下，肯定会有一些误伤，但这个比例不能高，否则容易引起相当多的冤假错案的出现。

在强力反腐高压态势下，承担主要任务的纪委以及各有关职能部门，一定要按照四中全会所强调的，依法治国，依法执政，同样也必须依法办案。没有法律这个底线，就很容易出问题。

齐鲁晚报：现在有人害怕五年后、十年后，反腐不能持续下去，您怎么看？

李永忠：十八大前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测，我专门撰文写过“十年三看”，即：十年看五年，五年看三年，三年看当年。当年看反腐败高压态势能不能形成，三年看政改特区能不能设立，现在强力高压反腐已经过两年了，政改特区必须尽快设立。如果三年内政改特区可以设立，那么五年内就可以将政改特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10%—30%的地方。这样下一个五年就有戏了。如果这三年内看不到政改特区的设立，五年内看不到政改特区经验在全国10%—30%的地方复制拷贝。那么，下一个五年，固化的政治体制弊端必将将掩盖蚕食或高调反弹，靠强力高压态势所取得的反腐成果——治标为主所赢得的时间，将因为未能转换为足够的治本空间，而付之东流。下一个五年即便想治本了，想设立政改特区了，恐怕就不是人力能及的了。

正是对这些年极其严峻的反腐败态势的深刻认识，正是对我们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的沉痛反思，习近平总书记才尖锐指出：弄不好，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。因此他鼓励地方各级大胆实践、大胆探索、大胆试点、大胆干。王岐山书记才在反腐败已经取得如此明显成效时，深刻指出：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。

因此，“刑上大夫”只是治标，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才能治本！

自身打铁

纪检改制

大案震慑

金融监控

审计风暴

